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72 ·

歷史·地理類

中國歷史散論

曉風著

中國歷史論集

呂振羽 翦伯贊
華岡吳澤

哲夫等著

中國史論集

翦伯贊著

中國史論集（第二輯）

翦伯贊著

上海書店

翦伯贊著

中國史論集

本書據文風書局1947年版影印

序

一九四〇年春，余自湘入蜀，至於重慶，時抗戰第三年中也。當余蹈入蜀境，不覺油然而記起李白有名之詩句；其詩曰：『噫，吁嚱乎，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非所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日月悠邁，自我入蜀，於今三年有餘矣。世界戰爭，正以日益擴大之規模而進行，中國抗戰，亦在艱苦中持續其發展，此正舉世蕭蕭然之際也。而在此大時代中，余則棲遲於重慶附近山谷之間，書齋晝閉，鴉雀無聲，日讀古史，夜數繁星，以度此悠悠之歲月。古人有言，『遺世獨立』，余不知余之遺世，抑世之遺余也。

余素喜攻史，尤喜攻古史，以古史去今日已遠，而範圍又至廣大，大有吾人馳騁之餘地。故入蜀以來，余之精力，大半消磨於中國史前史之研究。然間亦涉獵其他史籍，尤喜讀明史，以其亡國覆社，感人之深且切，而其史

實之足以資吾人今日之鑑戒者，又至多也。

歷史為有感性之科學，讀史者，往往因有所感而不能已於言，則著之為文。余入蜀以來，先後所著史論已有二十餘篇，雖所論列，皆過去之陳跡，然而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鑑也。因將入蜀以後所著史論，輯為本集，而名之曰『中國史論集』。

暴風雷雨，並不禁止蟲鳴，當今之世，余之史論，不過蟲鳴而已。然而蟲之所以鳴也，又豈徒然哉！

當余寫此序言時，日寇正猛襲洞庭湖濱，余之家鄉，方遭受敵人之嚴重威脅，余之祖母，即於余寫著此序言之前七日（四月十三日）驚悸逝世。書此以誌不忘，亦所以說明此書出生之時代也。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日剪伯贊於巴縣之歇馬場。

中國史論集目錄

序

一	略論中國史研究·····	一
二	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	二一
三	論夏族的起源與史前之鄂爾多斯·····	三五
四	諸夏的分布與淵藪文化·····	四八
五	殷族與史前渤海系諸氏族的關係·····	七〇
六	論中國的母系氏族社會·····	八三
七	論西晉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亂·····	九五
八	南宋初年黃河南北義軍考·····	一〇六
九	論南宋的漢奸及傀儡組織·····	一二五

一〇 論元代中國人民反對韃靼的鬥爭·····	一三八
一一 論明代海外貿易的發展·····	一六四
一二 論明代的閹宦及黨派政治·····	一八〇
一三 論明代的倭寇與禦倭戰爭·····	一九六
一四 遼瀋淪陷以後的明史·····	二一七
一五 論南明第二個政府的鬥爭·····	二三五
一六 清代宮廷戲劇考·····	二五四
一七 論辛亥革命與中國歷史之新的轉向·····	二六九
一八 論「五五」與中國憲政運動之史的發展·····	二八四
一九 略論十八年前的「首都革命」·····	二九八
二〇 泛論中國抗戰的歷史原理及其發展的邏輯·····	三〇一

一 略論中國史研究

一 一部廿四史從那裏讀起？

「一部廿四史，從那裏讀起？」這是中國歷史研究者發出來的一聲浩嘆。這種浩嘆，正是表現中國歷史研究者，對於龐大的中國歷史資料，沒有方法來處理了。

誠然，中國留下來的歷史典籍，的確是非常豐富，一部廿四史還不過是九牛之一毛。所謂廿四史，只是歷代增湊起來的一部官史，（唐只有三史，宋增至十七史，明增至二十一史，清增至二十四史）此外在史部之中還有汗牛充棟的私人著作，並未收入。若廣義的說，則六經皆史，諸子皆史，乃至歷代以來私人的文集，詩集，畫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議，地方的志書等，無一非史。再廣義些說，一切歷史的遺留，現存者與再發現者，亦無一非史。因而中國的歷史資料，真可以說浩如烟海。當作『歷史』，這些典籍，的確是太多；但當作『歷史資料』，則這些典籍，我們還覺太少，因此，問題還是不在於歷史典籍太多，而是在於沒有很好的研究方法。懂得了研究的方法，則一切的歷史資料，都變成了工程師手中的磚瓦，不懂得歷史方法，則結果便會被材料包圍而不得脫身。

所謂歷史方法，就是從千頭萬緒的歷史事實中，找出那一種貫通於他們之中的原理原則，使一

切歷史的事實，都在這種原理原則之前，得到正確的說明。這種原理原則不是用人類主觀的思維，可以想得出來的，而是從無數具體的歷史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因此要找出歷史發展的原理原則，還是要記得「歷史事實」。多記「歷史事實」，是研究「歷史方法」之基本前提。研究歷史的方法就是從歷史事實中發見歷史發展的原理原則；再用這種原理原則去說明歷史的事實。換言之，即從這千頭萬緒的歷史事實中，找出他們的相互關聯，找出他們的運動法則，找出他們發展的傾向。這樣，任何交錯複雜的歷史事實，在我們面前，便再不是混亂一團，而是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所表現出來的應有的現象。這樣，我們也就不僅可以知道歷史上的任何事實，「怎麼樣」發生發展，而且也可以知道他「爲甚麼」要發生和發展。

中國過去的歷史家，也有他們的歷史方法。如他們或以事系年而創爲「編年史」，或以事系人，而創爲「紀傳史」，或即事名篇而創爲「紀事本末」。但是編年史，則一事前後隔越，紀傳史，則一事彼此錯陳，紀事本末體對於歷史事實雖類聚而條分，原始而要終，但是他並沒有對於事與事之間給以聯系之總結果，只是一些孤立的事實。因之中國過去的歷史方法，可以說只是一種簡單的邏輯。用這種簡單的邏輯整理中國史，當然是不夠的。

近來實驗主義者倡爲點點滴滴研究中國史之議，實際上，這是乾嘉學派的舊方法，並不是實驗主義的新方法。所謂點點滴滴，不過是對於史料之疏通辨正，訓釋輯補而已，但對於這樣的工作，清代的歷史家，已經留下極大的成績。我們不是說，這種瑣碎的研究工作，對於研究中國史，不是必要的，反之，我們覺得這正是研究歷史的一個前提工作。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方法，就是點點滴

滿的歷史研究，也是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的。

在另一方面，新的歷史學，直到現在，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他依然是當作一種製成品，原封原樣地輸入中國。因此，在過去若干年間，這種外來的歷史學，一到中國，便成了若干教義的集成。近來，已有不少的歷史家在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史，但一旦接觸中國具體歷史事實的時候，便不能正確地運用方法論了。因此，我以為新的歷史家，在現在的任務，不是高調方法論，而是應該帶着他們已經知道了的方法，走進中國歷史資料的寶庫，去用歷史資料來考驗方法論。

在下面，我提出幾點關於中國史研究的意見，也許這幾點意見，可以幫助讀者對於中國史的研究。

二 看看大漢族以外的中國

中國的歷史家，過去以至現在，都是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處理中國的歷史，因此，過去以至現在的中國史著述，都不是中國史，而是大漢族史。

但是大漢族史，不是中國史，而只是中國史的一個主要的構成部分；真正的中國史，是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內其他諸種族的歷史活動之總和。因此，研究中國史，首先應該拋棄那種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之狹義的種族主義的立場，把自己超然於種族主義之外，用極客觀的眼光，把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內的諸種族，都當作中國史構成的歷史單位，從這些歷史單位之各自的歷史活動

與其相互的歷史交流中，看出中國史之全面的運動與全面的發展。

考古學的發現和無數古典的傳說指示吾人，活動於中國這塊地盤上之最初的人類是兩個系統的人種：其一爲「蒙古高原系」人種，其一爲「南太平洋系」人種。這兩系人種，在中國史前時代，還是處於匹敵的地位。他們具有同一水準的文化創造，而且他們之間有着不斷的文化上和血統的交流。此外，在同一時代，這兩系人種，又各自分裂爲許多民族，分佈於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自然環境之中，平行地展開他們各自的歷史活動。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他們或由分裂而再進於統一，或由統一而再進於分裂。因此，如果要了解中國史前社會的全部內容，就不能從某一人種的歷史活動得到說明，而是要從這兩系人種之文化的和血統的融混及其各自的分裂與統一中，才能得到說明。

在太古時代，中國並無所謂支配種族或落後種族，今日之成爲支配種族或爲落後種族，乃是後來歷史發展的結果。漢族的形成，是殷周以來「蒙古高原系」人種中的一部分融混的結果。直到漢代，這個混成的種族，才以漢族之名，出現爲中國歷史上之支配種族。自從漢族在中國這塊歷史地盤上成爲支配種族以後，於是不僅「南太平洋系」人種被稱爲南蠻或西南夷，即散在中原以外之「蒙古高原系」的諸種族，也被稱爲西羌北狄與東夷了。

因此，在中國史上，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秦漢隋唐以至明代之歷史的擴張中，漢族不斷地向中原以外的地域展開，因而使其他諸種族一步步的退出了中國歷史的領域。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看到漢族以外之其他諸種族也不斷地企圖或竟然侵入中原文化區域，如周之玁狁，秦漢之匈奴，

晉之五胡，南北朝之拓跋，隋之渾庭，唐之土番南詔，宋之契丹女真與韃靼，明之瓦剌阿魯台與滿清，這些種族或成爲漢族可怕之隣人，或竟壓服漢族成爲中國史上一時之支配種族。中國史就在漢族的伸張與其他諸種族的侵襲而表現出他的展開與萎縮之曲線。

在這種種族間之拉鋸式的錯綜伸縮的歷史過程中，由於戰爭，交換與和平的移民，必然要不斷地發生各種族間之血統的與文化的交流。由於這樣的交流而引起之彼此間的變化，才是中國歷史之全面的運動。因此我們研究中國史，應該盡可能的去搜集漢族以外之中國境內的其他諸種族的史料，從這些史料中去發見他們自己的歷史之發展，以及在他們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之彼此間的相互關係與相互影響，這樣，我們便可以發見中國史並不是一個漢族所演的獨角戲，而是許多種族爲了發展其自己而表現出來之歷史的活劇。

三 再看看中國以外的世界

中國的歷史家，過去以至現在，都把中國史當作一種遺世而獨立的歷史。換言之，卽把中國史從其與世界史之關聯中，截然地割分出來；使之成爲一個與世絕緣的孤立的歷史單位。

但是我以爲當作一個獨立的歷史單位，中國史固然有其自己之獨特的運動和發展；當作世界史中的有機之一環，則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又決不能劃出一條絕對的界線。在現實的歷史發展中，地理的疆域，決不能範圍歷史的衝決，因而中國史的變動，往往影響世界史的發展，反之，世界史

發展之總的傾向，也必然制約著中國史的發展，中國史之於世界史，正猶細胞之於人體，他是一個個體，但他決不能離開人體而自由的發展其生命。所以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必須要顧到他與世界史之間的關聯。

舉例來說，在西漢初，匈奴南侵，與原住甘肅山谷間之月氏發生衝突，這是中國史上的一個事變，但月氏却被迫而西徙，渡流沙，踰葱嶺而「西君大夏」，因而從塔里木河流域（即今之阿姆河）驅逐了希臘人的勢力，使「塞王」不得不南徙罽賓（即釋迦彌羅，今之印度北部）希臘人南徙罽賓之後，月氏人又踰希臘人之後，奪取罽賓成為印度的共主。這樣中國史上的一個事變，但因此而使西羌之一支西徙中亞。同樣的史實，由於兩漢之北擊匈奴，匈奴之一支（即北匈奴）遂開始西徙的行程。當中國漠北無王庭的時候，而在歐洲之多腦河萊茵河及波河流域却布滿了匈奴的族類，當時的匈奴，成為歐洲東北諸種族之嚴重的威脅，因而加速了日耳曼人的南徙，從而促成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這樣中國史上的一個事變又影響到日耳曼人及羅馬帝國的歷史。

又如阿育王之宣揚佛教，這是印度史上的一個事件，但因此而使佛教文化東播中國，成為南北朝以至隋唐時代中國之支配的精神。到宋代佛教中的一個宗派（禪宗）并且與儒家哲學結合，而產生了中國的「理學」。這種理學，自宋以迄於明末清初，又成為中國人民之支配的精神。這樣印度史上的一個事件，又影響到中國文化思想的內容之變革。

以上，不過略舉數例，但由此亦可看出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係，真是牽一髮而全身俱痛。大概說來，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係，早在史前時代，恐怕就已經存在，如屬於傳說中夏代之彩陶文化身

安諾蘇薩的彩陶文化，也許有著某種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後殷代的文化與巴比倫的文化，周代的文化與希臘文化，也許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更後則秦漢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在中亞之交流，隋唐文化與阿拉伯文化及印度文化在中亞之交流，元代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在中亞與東歐一帶之交流，明代文化與西歐初期資本主義文化在南太平洋上之交流，更為彰明較著之事實。最後，西歐資本主義的文化，便像水銀瀉地一樣，無孔不入地注入了中國社會的每一個毛孔。這樣看來，中國史決不是一個孤立於世界史之外的東西，他不斷地以其運動給與世界史以影響，而世界史之發展的傾向，也時時給與中國的運動以制限。

因此，我們研究中國史，必須注意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聯，以及由此而引起之變動。並且必須考察由於這種變動而產生之經濟生活，政治變局，以至藝術宗教之新的內容。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瞭解中國史中每一個時代在世界史中所處的地位，從而在不同的地位中所展開之不同的活動。

四 中國史沒有奇蹟也不是西洋史的翻版

中國的歷史也和其他民族的歷史一樣，他的發展，決不能逸脫世界史發展的一般法則，但也有其自己的特殊性，——雖然這特殊性在究極上是被制約於歷史發展之一般法則。因此我們研究中國史，應該從他的發展之一的法則中找出他的特殊性；同時，也應該從他的特殊性中去發現他的發展之一般法則。假如我們把任何一個方面提了出來而加以誇張，那都會失去中國史之本來的面

貌而得出一種不正確的結論來。

近來有些歷史家往往強調中國史的特殊性；他們把中國史描繪成爲一個神奇的東方之天國的圖畫，在這裏充滿了歷史的奇蹟與人類社會的神祕，一切都是特殊，中國史就是一個與衆不同的特殊史，因而世界史發展的一般法則，在中國完全不能應用，從而作出了中國史上不是缺了這個社會便是短了那個社會之結論。像這樣的看法，當然是神經衰弱的歷史家之感官上的幻覺，與中國歷史之客觀的實在性，並沒有關係。

另外有些歷史家，則強調中國史的一般性，他們不是用一般法則代替現實的中國史，便是用一般法則硬套具有特殊性的中國史，結果，在一般法則之前，中國史變成了一片灰色的東西，他失掉了一切的特殊性，幾乎變成了西洋史的再版。實際上，所謂一般法則，只是在大體上近似地不完全地把變動中的歷史現象反映出來，他並不能攝取現實歷史中之無限豐富的內容。在現實的歷史中，中國史中的許多現象，決不能與西洋史完全沒有偏差，因而一般法則便不能一舉而完全正確地把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都反映出來。

考古學的報告和歷史資料指示吾人，中國史也履行了世界史發展之一般的過程。許多舊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發現，證實了中國曾經有過原始公社制的社會之存在。殷墟出土的青銅器文化和許多甲骨文字的記載，又證實了中國歷史中之殷代已經進入奴隸社會。根據若干可靠的古典文獻及金文的記載，中國從西周時起已開始轉向封建社會。到秦代，中國的封建社會，雖然轉向專制主義的形式，但在本質上，仍然是封建社會。到清代中葉，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已經孕育出資本主義的

因素，假如沒有鴉片戰爭，則中國的歷史，早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了。這樣看來，世界史發展的一般法則，也同樣貫穿著中國的歷史。

雖然如此，中國史也有其特殊的地方，比如中國殷代的奴隸制，沒有發展到希臘羅馬那樣典型的形態，中國的封建制，很早就採取專制主義的形式，而這在西歐則直到十五世紀才轉入專制主義的形式。因此，當我們研究中國史的時候，不應強不同以爲同；但同時，也不應因爲形式上的不同而遂懷疑歷史發展階段的本質。換言之，我們不應把殷代的奴隸制誇張得像希臘羅馬的一樣；反之，也不能因爲殷代的奴主每人平均沒有分配十八個奴隸，而遂謂殷代不是奴隸制。同樣，我們不應把秦代的封建專制主義與西歐十五世紀的專制主義相提並論，但也不應因爲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之早期出現，而遂謂不符合於公式。總之，我們應該承認中國史發展是遵循着世界史發展之一般法則，但同時，也切不可抹殺中國史自己所獨有的特殊性。

五 注意客觀的傾向也不要忽略主觀的創造

我很早就說過，在舊的中國史著作中，看不見社會經濟的影子，在新的中國史著作中，看不見歷史人物的名字，如果前者是觀念論則後者便是機械論。

我以爲研究歷史，一方面，固然應該注重社會經濟對歷史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也不應忽視人類的主觀鬥爭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只注意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忽略人類之主觀鬥爭，那就無

異說任何人類的歷史行動對歷史都不發生作用，而歷史的發展，只是經濟的自動發展。反之，如果只注重人類之主觀鬥爭，而忽視社會經濟對歷史之決定作用，則又無異說，歷史是英雄手中的一塊泥土，任他捏成他所需要的形式，而一切客觀條件，都失掉了對人類主觀鬥爭的制限性。但是在現實的歷史發展中，人類的主觀鬥爭，在歷史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如中國史上的許多王朝，大半都被人民叛變所顛覆；反之，社會經濟對人類的主觀鬥爭，也有着決定的制限性，如中國史上許多反動的英雄，都一個個跟着一個犧牲於社會經濟前進的車輪之下。因此，我以為歷史的發展，不僅是經濟的自動，也不僅是人類鬥爭之自由創造，而是社會的客觀條件與人類的主觀鬥爭之辯證的統一。所以研究中國史和研究其他民族的歷史一樣，一方面，應該撥開許多複雜的現象，去發現那條通過傾斜曲折乃至倒退的過程而貫通於中國史之社會經濟發展的曲線；另一方面，也不要忽略活動於這一條曲線上下之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的活動。

在歷史上，人類的任何行動，都不是出發於主觀的幻想，而是當時社會經濟內部的軌轍之政治的表現。因此人類的任何歷史行動，都不是爲了主觀上的快意或仇恨，而都是企圖作用於當時社會經濟狀況之改變或保守。暴君的虐政，農民的叛亂，並不是暴君與農民私人之間有甚麼仇恨，而只是當時的經濟現狀不調和而已。換言之，經濟發展的傾向，決定人類歷史行動的方向，並且制限人類歷史行動的範圍。

在相反的方面，人類的主觀鬥爭，對歷史的發展，也演着重大的作用。例如兩漢之世界擴張，固然是當時社會經濟的客觀要求，但如果沒有武帝明帝那樣雄才大略的英主之領導，沒有張騫班超